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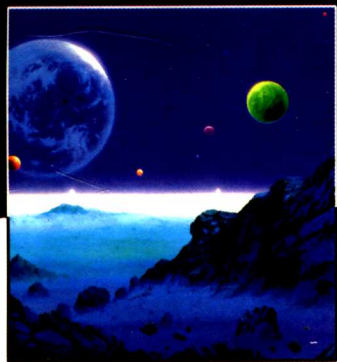


SHUIFENG CONGSHU

世纪风丛书 | 包亚明 主编

现代文学 与 现代性

现代文学
与
现代性



生于六十年代

学人批评文丛

旷新年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现代文学与现代性

旷新年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丛书策划 唐继无
责任编辑 唐继无
装帧设计 王月琴

现代文学与现代性

旷新年 著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开本	850×1168 1/32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印张	7.7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千字	210 插页 2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版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次	1998 年 6 月第 1 次
		印数	1—5100

ISBN 7-80613-531-6 / G · 593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1

- 文化立场
- 共同经验
- 知识传统
- 代际差异

话语的秩序 13

- 现代文学之现代性 15
- “后现代”神话 25
- 作为文化想象的“大众” 35
- 现实主义：回归还是死亡？ 40
- 传统与激进：同一时空的颀颀与共生 47

人海杂言 51

- “后现代”与“后国学” 53
- 从界外思想 56
- 阿 Q 的纽约 60
- 韩少功现象 62
- 由胡适所想到的 65

钱鍾书：人生边上的智者	68
文集现象	70
话说寂寞	72
哀世挽歌：《废都》与《白夜》	74
文学史现场	83
1928 年的文学生产	85
京派：历史与想象	95
鲁迅小说的潜结构	122
《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	132
《故乡》的读解	138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	144
重读学衡	161
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	163
学衡派对现代性的反思	184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文化	200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批评	214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 文化立场
- 共同经验
- 知识传统
- 代际差异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198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中文译本出版之后，几乎每一个中国小说家都会这样牙牙学语了，这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我们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仿佛是在标语口号的大跃进中，而不是在日月星辰的变换之中长大的。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三个历史时代，遇到“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宏伟堂皇的题目，排比起来，毋庸置疑将会赋得一篇辉煌大章。然而，我不幸脱离了作为公共仪式的操练的集体经验。作为农民的孩子，饥饿是我早年成长的记忆，这种饥饿记忆将我与那个时代分隔开了。甚至因此我不信任所谓“集体记忆”，因为“集体记忆”很容易像舞台布景一样被置换，只有“个人记忆”才可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这些从“集体记忆”边缘脱落下来的“个人记忆”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丑之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因此要否认“代的逻辑”，因为“代沟”这一个明显的裂痕主要是随着“80级”这一代“最年轻”的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后开始出现的。我们仍然记得牛仔裤、喇叭裤、披肩发和邓丽君的歌曲在80年代的冒险经历，忧心忡忡的前辈担心我们成为“垮掉的一代”；其实，“垮掉”是强加的关怀，而“代沟”则是我们自己的标新立异，是作为一种自我意识，一种宣言而流行起来的。其时，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的诗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朦胧诗成为新时期的文学革命先锋。从来没有哪一种诗歌语言产生过如此巨大的表达力。它具有诗歌语言罕有的，至今仍然使人怀念的明晰和凝聚力。今天，诗歌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私人生活”，与这种“共识的破裂”相比，朦胧诗可以说曾经建立了一个80年代的明净的公共空间。

1980年我考入大学，在改革和开放的新时期汇入了“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的时代冲动之中。“进步”、“现代化”、“与世界对话”的时代主题和热切渴望在这样的观念和命题中得到了充分凸显：“走向世界文学”、“人的现代化”、“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成为话题的热点；《光荣与梦想》、《激荡的百年史》等美国和日本的现代史著作发出核爆炸般的巨大冲击；汤因比《历史研究》所提出的“挑战—应战”

模式调动着时代的思想；“旧三论”、“新三论”、“理论热”、“方法热”、“创新热”和“文化热”此起彼伏、方兴未艾。学术思潮的强烈节奏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时代进步的紧迫和脚步的匆匆。

历史，我们在哪里错过了你？这是一个迟早需要提及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面对在拨乱反正之后“新时期”里的种种遭遇。我们遇到了各种抒情线索：尼采、萨特、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在 80 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形成了一道道冲击波。我们因此迷醉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亨利四世》、《犀牛》等现代派作品之中，尤其是卡夫卡这个怯弱的天才那种令人绝望的智慧使人意荡神迷的感觉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又别有一种亲切感。课堂上的枯燥乏味和课堂外的日新月异形成鲜明的反差。那个时候，旷课倒是我们经常的功课。

从诸如“垮掉的一代”、“晚生代”和“新生代”这些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我们 60 年代人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尴尬。正如转型期是对处于过渡因而无名状态的一种命名一样，我们这必然要被转型掉的一代命中注定了是一种历史的中间物，一些无名之辈。如果让我写一部关于 60 年代人的“成长小说”的话，那么劈头一句该是——“给我讲个故事吧！”生命必须有个故事才算是有个架子，必须有情节才有高潮。正如胡适曾经为中国小说没有一个 plot(情节)而感到自卑一样，60 年代人也因为缺乏故事和高潮而平庸，少了上一代人的英雄气和主人感。记得 80 年代，曾经有一首著名的流行歌曲叫做《迟到》。迟到，也就是说，沦为晚生代。

50 年代人改天换地、创造历史，作为红卫兵“造反有理”，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老三届”大学生在“科学的春天”里再铸生命的辉煌。他们造反、插队、上大学、成正果的“天路历

程”早已被谱为一篇篇传奇。《中国知青梦》、《知青备忘录》、《光荣与梦想》、《知青日记》、《岁月随笔》等书如涌如潮反复见证他们苦难——奋斗——成功的历史。从 80 年代的“反思”到 90 年代的“怀旧”，知青神话已经不仅仅是知青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了。

50 年代人是历史的主人公，作为“晚生代”的 60 年代人则不过是历史的旁观者。他们处于历史边缘的无名地带，借用我的同学许扬的自传性小说的标题就是“傻角”。90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边缘化”成了一个人云亦云的话题。50 年代的知识分子几乎守护过每一种正统。然而，守护同时意味着依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希望修身治国平天下，其终极理想是做国师。作为与历史脱节的“晚生代”，作为无名的“转型期”人，60 年代人位于正统的话语的边缘，他们不必“代圣贤立言”。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时尚，在中国大陆流行一时然而目前已经声名狼藉。如果回到法国的解构主义运动中去，那么解构的精灵在 60 年代生长起来的这种无根的生物上找到了寄主。因此，如果使用“60 年代人”这个概念的话，我愿意它不仅是指 60 年代出生的芸芸众生，而且也指他们对一种解构的立场的分享。所谓解构，是对于一切权威、结构、真理、知识的讨论和评注活动。它不是破坏，却也不是固定和封闭。它不是以理性、主体现代化以及任何一种绝对的目标和价值终结历史和思想，而是相反，它要在思想终结的地方重新开始思想。

一个由爱弥尔·左拉的“我控诉！”所展开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最终同样是用法语来宣布：“知识分子死了！”在经历了一个思想的、动荡的、革命的、进步的时代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宣告形而上学的终结的“上下都很平坦”的时代。90 年代，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刻。今天，我

们进入了理查德·罗蒂所谓的“后哲学文化”的时代。它好像是一个没有思想扰乱的年代，一个无梦的和平繁荣的年代。这是一个思想和现实完美结合的没有“他者”的时代，一个拒绝了想象的时代，90年代文学的一个致命之处就是想象的贫乏和衰竭。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诗人转变为广告人，小说转变为纪实小说。文学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雪莱曾经把诗人比作夜莺，可是结果文学在今天变成了最势利的一种东西。

关于90年代，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有人甚至将思想和学术割裂与对立起来。他们抬起了胡适的老调子：“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岂不知，撇开主义，哪来问题；没有思想，何来学问。思想为里，学术为表。学术是珍珠，思想是那串起来的线索。不然，岂止是“支离破碎”！后现代主义想要质疑元话语，取消大叙事。可是又焉知，没有大叙事，又何来小叙事？事实上，思想或话语一经改变，知识的面貌就会在顷刻间全然改观。正如胡适的科学的“新红学”谬种流传一样，90年代产生了多少吓人的“新学问”。马克斯·韦伯认为，禁欲——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他是要想以此驳倒马克思的《资本论》。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忽略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紧密关系，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只是马克思的见地与韦伯大相径庭而已。他将韦伯恭维的那些资本主义的创业者称为“严峻的新教阴谋家”。他在《资本论》中引用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威·豪伊特的观察：“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马克思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历史的秘密：“美洲黄金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奴役、被埋葬于矿井和被剿灭，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

掠夺,非洲变成猎获黑人的商业性饲养场;这就是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曙光的田园诗式的原始积累过程。紧接着爆发了以整个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明明白白的资本主义历史能够被可敬的学者们做成各种各样的学问。因此,马克思义愤地指出:在现实历史的编年史中,征服、奴役、劫掠,总之,暴力统治占优势。但是在恬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按照这些教科书的说法,劳动和权利从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要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性,但是同时他从来也没有把这种制度神圣化和永恒化。他说:“我们为了取得我们的成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畅通无阻,为了使劳动者与劳动条件分离,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勤劳的贫民这一艺术杰作,现代史的这一最高创造物,我们经受了多少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思想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用。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那本引起了“凯恩斯革命”和造成了“凯恩斯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

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福柯指出:“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了,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着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思想。”

90年代,一套知识的生产和消费的机制正在生长和形成之中,一个知识的拜物教正在建立。学术规范是知识合理化的过程。知识合理化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合理化主义而来的。没有人对这一合理化进行质疑和挑战,揭露这个合理化过程的专断性质,揭露这一合理化本身仍然有待合法化。我们明白地看到,在这一合理化过程中,思想将被作为不合理的东西而被排斥和取消掉。在知识的市场上,知识的消费、品牌的竞争以及资本的竞争已经很明显,正如在工业制造业中,三资企业占据竞争优势,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在知识生产方面也同样如此。中性化成为90年代知识分子的明显趋势。他们拒绝大问题,然后按部就班地经营一些小问题,逐步沦为大学体制内的配件,成为固定的齿轮和螺丝钉,为了消费而自动地生产更多的“知识”,并且通过“品牌”去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地位。与作为思想守护者的知识分子相反,学者是知识的看守,他们所忧虑的是找不到研究的韵脚。

从80年代“学科重建”以来,专业的分化已经开始。80年代的“学科重建”,说明白了是一场悄悄的心照不宣的“圈地运动”。老师的一辈已经把大的思潮、流派、作家做完了,学生的一辈就去找边边角角、荒天僻地,去找二流以至三流的作家,一步一步,等而下之。用现代文学圈内的说法是,现在局长、处长一级的作家都已经被做完了,再接下去就是去找科长、科员一级的

作家。学术合理化就是要“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因此，中文系的毕业论文如果做得像历史系、哲学系的论文，或者现代文学专业的论文越出了现代文学的范围，就成了“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就像工厂流水线生产标准化的产品一样，体制化的大学也批量生产知识产品，学术职业化将生产思想狭窄的教授和中性的专家。正如赖特·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所说的：“研究院大大发展起来，甚至可以机械性地授予博士学位”，“研究院常常组织得像‘封建制度’；学生把忠诚出卖给一个教授，取得他的保护，以免受其他教授排挤。风度翩翩、愿意走既定道路的年轻人会和真正埋头治学的创造性天才同样易于甚至更易于成功。”这种标准化的生产制度生产出来的学生将会是合乎学术规范的候选学者，将会按照既定的工艺流程自动地批量地生产知识——“朴学”。他们将会成为学院各个不同门坎的大小哨兵，获取“终身教授”之类的荣衔，他们是知识的忠实看守，但是，小至现实问题，大至人类命运，他们则缺乏关怀的热情和能力。

我们是以身体偶然和学术相遇的，我们不可能达到“学者的 人间情怀”这样俯念人寰的高度。在我们这里，学术的巫术氛围扫荡已尽。做学问就和扫大街一样是一种日常工作，只要假以时日 and 勤奋，每个人都可以把他的那一块地盘打扫干净。

海德格尔说，“此在”是一种“在世”——“在世界中存在”。我们反对绝对主义。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知识就是经验，经验就是思想。我愿意借用顾准的一个说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也就是说，从认识论的立场到解释学的立场。

我着迷于一些无名的境遇，一些可以不断替换的可能性。我喜爱晚清由传统中脱落下来的文人、小报、滑稽文、游戏文所组成的意义模糊的世界，在新与旧之间漂泊无归的文人，他们克服惶惑不安的唯一方法就是对于经典进行戏仿。我喜爱晚明烂

熟的文明,在破碎和混乱之中重建知识,也就是说重建经验。我喜爱希腊悲剧——人和宇宙的脱节的状态。我喜爱流浪汉小说广阔无序的世界。比起戏剧来,小说是一种真正“现代”的文体,一种无名的修辞。戏剧能够被做成“样板戏”,可是,却累死也做不出“样板小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本质上,小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卑微世界,一种低级的方志。按照黑格尔、卢卡契、昆德拉的观察,小说是一个上帝退隐之后的成为问题了的的世界。小说的出现意味着史诗世界的崩溃。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现代小说的主人公就开始在一个无法预知的、丧失了确定性的、漫无边际的世界上冒险。

我爱好历史。与其说我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不如说我关心现代中国的形成。而所谓现代中国的问题,又是作为同构的自我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暴露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上,因此不安,甚至焦虑,必须通过知识的阐释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与世界建立一种经验性的关系。因此,没有本质主义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只有在世的中国。

我们正面临一个消费的时代,一个精品的世界。我们正处在高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猛烈的城市化过程。从农村到城市,我们的经验突然脱节。作为一种转型,作为一种记忆的摧毁,正如邱华栋的小说所表现的城市经验——都市表象的狂轰滥炸。城市是一种多彩的涂改液,有力地抹去了历史。城市是一种境遇,是变幻之神。它与其说是一个实体,不如说是一座符号的迷宫;它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艺术品。城市是一个戏剧化的东西,是一种建筑的辩证法。城市是一个现代神话,是能量的极度蓄积,但它又是一个解构主义文本,一个

没有中心的自由游戏。

城市迅速摧毁了人类的家园经验。只有所谓的“新生代”或“新人类”才可能和城市建立一种融洽的血肉的关系。我们则生活在城市边缘。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撷取波德莱尔作为现代文人的典型肖像：波希米亚人，拾垃圾者，游手好闲者。从根本上，我向往于一种现代的游猎生活。报纸上井然有序的分类广告，电视上蠢蠢欲动的物质洪流，城市街道纵横交错，商品橱窗琳琅满目，霓虹灯颠倒白天黑夜，立交桥扰乱四面八方，在灿烂迷乱的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游荡，目眩神迷，好奇、张望、品尝，从大众社会和物质洪流的边缘投去偶然的一瞥，不经意地写下一些笔记和评注。30年代，本雅明对于摄影和电影的伟大发现，鲁迅在上海“且介亭”写下的“立此存照”的新型文本。一些零散化的笔记和评注，是对都市无意识的掘发。这就是所谓文化批评时代的到来，玄学式的文学批评的终结，一种新型知识的诞生：一种没有边界，也就是说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类型和知识面貌的再生的知识。

福柯说：“历史注定我们要面对历史，要耐心构造话语的话语，要担负倾听已被说出的东西的任务。”一切过去的知识都将转变为现在的知识，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知识都将成为我们思想的资源。90年代的所谓“本土化”是一种在“我执”、“他执”牵制之下不知怎么说才好的一种说法。自王国维以来，世界就豁然贯通，即以狭义之传统而言，它也不仅指三坟五典、四书五经，而且同时也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旧约》……

解构主义不是在哲学专业，而是在文学领域勃发，因为对于文学来说，我心有感焉，正好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因为文学从根本上是反法则的，使巴赫金心醉神迷的“复调”和“狂欢节感受”是其极端表现。有人将文学天才和疯狂联系起来以

揭示文学的性质。以《狂人日记》来揭开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页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五四”新文化运动充分调动了文学的力量。文学革命推翻了古典主义规范：礼教、律诗、文言文，创造了新的道德、新的文学类型和白话文。对于新儒家来说，“五四”是一个该死的疯狂的解构主义者。新儒家所要维护的是儒家的一尊正统，而“五四”则是要重新肯定诸子百家的地位。胡适以白话文/文言文、正统/民间、上层/下层的颠覆对意义进行了重新书写。解构在根本上应该成为一种抒情，文学不是抽象地谈论创新，而是在非法/合法的边缘拯救无意识的意义。

福柯说：“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

但愿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多一些知识分子气质，少一些文人习气。

